

· 孟繁华文集 ·

当代文学：终结与起点

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

M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I

繁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孟繁华文集 ·

当代文学：终结与起点

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

M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终结与起点:八十、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孟繁华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孟繁华文集)

ISBN 978-7-02-012461-9

I. ①当… II. ①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8925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刘 健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60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页3

版 次 2018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61-9

定 价 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1978年初中毕业十年后,我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历史系非常著名,尤其是世界上古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入学后,给我们78级上课的,恰恰是世界上古史的权威专家林志纯先生。林先生是福建人,一口浓重口音的福州普通话。出生于1910年的林先生,1978年已经68岁了。他个头不高,但非常挺拔。上课时他没有讲义没有教案,手里举着一支粉笔便走向讲台。林先生讲的是亚述学。作为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听一个顶级专家用福建普通话讲从未听说过的学问,其情形可想而知。

我觉得自己难以完成学业,于是便有了强烈的转到中文系学习的想法。那时的大学不允许随便转系,我也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转系过程。最终还是如愿转到了中文系。我这样叙述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的过程,说到底还不是遇到林先生而“知难而退”——78级历史系的同学除了我都学得很好,而且有许多人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现在想来也真是对不起林老先生了。

说到底,转系还是个人兴趣使然。一个初中生大概也只能对文学感兴趣——因为可供选择的兴趣实在太有限了。那时东北师大的中文系也是名系。著名学者杨公骥、蒋锡金、孙晓野、何善周、孙中田等都在那里任教。1982年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任教,从那时起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专业教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院校差别很大,教师基本是组织教学,聘请国内各学科造诣较高的学者做主讲教师,本校教师做的应该是

教辅一类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接触本学科最好的老师。谢冕教授、洪子诚教授、刘锡庆教授等，就是我在电大组织课程时开始接触的。在组织“当代作家谈创作”课程时，也就是1983—1984年期间，我也有机会先后见到了晓雪、流沙河、周克芹、刘宾雁、刘绍棠、李国文、张弦、李准、叶文玲、汤吉夫、路遥、雷抒雁、张抗抗等著名作家，这些当然使我对当代文学有了另外一种有趣和更加直观的感受。

1989年，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然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谢先生以“批评家周末”的沙龙形式教学，既是上课也是讨论。洪子诚老师以及陈晓明、王宁、韩毓海、旷新年等学者，都参加过这个沙龙。这个沙龙坚持了十年，在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谢先生被称为北大民主的象征，科学的象征是严家炎先生。谢先生民主、宽容，但做起事来极为认真。他除了组织学生上课讨论之外，还先后组织出版了大型丛书或书系多种，有的大型书系我以“跑龙套”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组织工作。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到北大学习，使我对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学术工作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客观地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进入北大开始的，或者说，是老师谢冕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后来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并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社科院文学所是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研究条件、学术气氛和研究水准在国内都堪称一流。我的主要学术著作和文章，大都是在文学所完成的。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所。

张炯、樊骏、杜书瀛、陈骏涛、董乃斌、赵园等学术前辈，既是各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从事学术工作的榜样；汪晖、陈晓明、蒋寅、许明、吕微、李洁非、陈福民、靳大成、彭亚非等同事风华正茂，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抱负，都曾深刻地影响着我。

后来，我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

研究所所长,工作至今。沈阳师范大学不是名校,但它是一所充满朝气、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的大学。学校给我的学术空间和特别支持,我深怀感激。

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议论的学科,甚至是一个只可意会的、受到“歧视”的学科。任何人都可以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只因为它“没有学问”。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是否“有学问”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见识和见解。不是说研究与历史有关的、越是古老的学科就越有学问,研究当下的就没有学问。事实上,研究与历史有关的学科,也一定要与当下建立联系。这就是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理论、问题、知识等,都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对历史的阐释和处理之中;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上游”学科的知识、没有西方的理论和创作知识,想做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屑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显然有偏见,是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缺乏了解的表现。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学科更重要,而是说,客观地看待一个学科和它的研究者,可以使我们少犯或者不犯常识性的无聊错误。

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三十多年,陆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字。文集是从这些文字中编选出来的。我知道,纸质媒体虽然是全媒体的一部分,但它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趋势已无可避免。纸质媒体加上文学批评这个行当,二者合在一起,其命运不难想象。当然我也知道,学术活动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大红大紫,那也不是学者工作的目标。我们不必神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候,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

以上是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教学和批评工作的简单履历,无甚新意。

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接受出版这套文集。尤其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她的认真负责让我非常感动。她的工作避免了

文集中的一些问题。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感谢我的老师、学生和朋友们。正是因为他们,红尘滚滚的人间才如此可爱,枯燥的学术活动才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和从事。

2016年9月22日于北京寓所

前记：心灵的报告

这本评论集，选自我八十、九十年代的评论文章。只有一两篇文章选自新世纪，是为了集中表达我对某个文学问题的看法。集中看自己以前写的文章，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但这没有办法：个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国家开放大学）中文系任教。刚到北京很是新鲜新奇，当然也免不了慌里慌张。严格地说，那时对学术的了解非常肤浅。与各种文学圈子都没有建立联系，甚至也没有这一意识，因此那时也难以进入时代文学的核心话题。八十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现代派文学、朦胧诗等的讨论如火如荼；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此起彼伏。但于我来说，也只是知道正在发生这样一些文学现象或思想界的事件而已。我那时能做的事情，除了教书，就是写一些作品评论性的文章。1984年前后，我能够在《十月》《文学评论》丛刊、《新文学史料》等名刊发表文章，已经极大地满足了一个“外省青年”的虚荣心。但也仅此而已。

幸运的是我在那个年代来到北京，使我后来有机会接触了我敬仰已久的学术前辈和知名作家、批评家。比如谢冕、洪子诚、陈骏涛、李陀、陈建功、郑万隆等。他们让我对学术和文学批评有了不同的理解。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些经历。

理想这个词，已经被千百遍地谈论，在今天因其古旧而格外不适时宜，人们对假它的名义实施精神统治和暴力的时代记忆犹新，它因华丽和富于想象被无数次地复制和利用，它被填充过许多甚至完全

不同的内容。因此,人们对它的不屑乃至惊恐是大可理解的。在实行了商品经济的今天,这个与实际利益相去甚远的词语,既不能将人带进宾馆酒吧,亦不能改善人的就业与生存焦虑,它的不实用性还多少有些奢侈的意味。不同的是,今天毕竟为人们的信仰情趣提供阔大的空间,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有人可以不喜欢这个词乃至它的精神指向,但也可以有人喜欢它并坚定地坚持它。精神统治的时代结束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干预或压抑心灵的自由。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交换并转化为消费的时代,有人愿意让心灵栖息于别处,以想象的方式走向生命的彼岸、寻找精神的故乡,也自是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我应该属于红卫兵一代,初中一年级还没有读完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边远的东北小城,无知而疯狂地写大字报、撒传单、上街游行、斗“走资派”、打派仗,参加毛泽东思想战宣队,我们幼稚地谈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然后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时代最大的幸福在一个少年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经过短暂的复课闹革命,毛主席就让我们下乡了。

在乡下,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边参加劳动,边进行阶级斗争。那些丝毫没有反抗能力并接受了许多年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又经受了一轮残酷的批斗打击。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会再有“变天”的幻想,那种斗争,足以把神经最坚强的人彻底摧毁,何况已经卑微到毫无尊严可言的“黑五类”。

“文革”和下乡,是我们这些人最初的集体记忆。当我置身其间的时候,还不具有对它怀疑和反省的能力。而是对那种充满了“革命”气氛的生活深怀好感,内心洋溢着单纯圣洁的向往之情。北京是我心中的圣地,世界革命的幻觉虽然所指不明,但却构成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记得有一次从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了一首手抄长诗,是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诗中有强烈的格瓦拉革命输出主义的思想,参加大战的红卫兵终于又一次攻占了“冬宫”,而他们却饮弹身亡。这样的情形让我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就如同后来最喜欢的文艺

作品是歌剧《江姐》、样板戏《杜鹃山》《沙家浜》、电影《大浪淘沙》一样。这些想法虽然幼稚无比，但却培育了我最初的理想主义情怀。我至今仍然相信，如果理想不付诸政治实践，不以权责的强制性构成精神统治，它仅流淌于人的内心，成为人们情怀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不好。无论是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假如一点浪漫情怀都没有，一点诗性都没有，我们通过什么同它保持情感联系呢？

1978年我考取了东北师大历史系，读了不到半年就转到中文系，就我个人的气质和情趣而言，学文学可能更合适。这一选择与我内心潜在的理想情怀是大有联系的，那种不那么现实的、想象的心灵生活，对我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吸引。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这是我十分愿意的。我常常和其他院校分来的同事在夜晚漫步于长安街和广场，心情辽远而爽朗。当北京的神性渐次蜕去之后，我仍热爱它的阔大和辉煌，这是其他许多城市都不能相比的，当然，这仍与我对这座城市的想象有关。八十年代，我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这个时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文学界所有的表达，几乎都没有超出这一思想范畴，每一潮流的措辞，都有清晰可辨的目标关怀，宏大的叙事潜隐于各种文本的背后，对言辞的热爱本身，急于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的和浪漫的精神。这期间，我主要出版了三部学术作品，即《新时期小说诗歌十讲》、评论集《文学的新现实》和《叙事的艺术》的小册子。严格地说，八十年代我并不具有研究能力，这三本东西的肤浅，以至于有人提及便心惊肉跳。

我于1989年9月来到北大，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就学于谢冕先生。那一时代学界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它已不只是平静或沉闷。谢冕先生在考虑什么我无以得知，但他能一如既往地带领他的学生们认真研究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以学人的情怀回望历尽沧桑的二十世纪中国，则让内心惶惑不安的我们得以平复，重新回到了书桌前。我在北京做了两年访问学者，1992年考取了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工作了十年之后又重新成为一名学生，这为很多朋友所不解。事实上，人到中年，对学位职称之类的“明码标价”已失去了兴趣，我

所喜欢的是北大独具的学术气氛和谢冕先生的人格情怀。我至今仍认为那是我当时最好的选择。

可以说,走进北大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了问学生涯,才有可能认真清理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和精神历程。不可否认,精神传统和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培育了我强烈的对公共事务的介入意识,“革命”的记忆也无可避免地潜隐于我的思维深处,那种“激进”的“战斗”方式常常不自觉地流入文字之中。当将这本文集编好之后,我自己也惊异地发现,反复出现于文章的常常是诸如“百年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纪之交”,以及“精神统治”“关怀忧患”“文化焦虑”“精神裂变”等一些历史时间和精神世界的“大词”。这些都无意识地表达了我的思维方式和内心期待的学术目标。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个朋友对我在发言中经常使用“中国”一词,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版图就是他思维的版图,他很难跨出这个版图一步。”他说的是对的。许多朋友都以一种宏大的视野和胆魄大量使用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概念,并因其“新”而被称为“先锋”,这是他们的自由,也自有其意义。但于我说来,对这些来自域外的理论和方法从来都深怀警惕和慎重。全球一体化的幻觉使许多人以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和问题,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人类共同的文化问题及冲突将构成新的显学。这一设定本身是大可怀疑的,它仍是西方学者全球文化支配欲望的一部分。事实上,每一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是十分不同的。因此,我只能对当下中国的文化文学问题表达我的关注。而原生于西方的理论及概念,由于它的对象和处境的不同,它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解释当下中国的文化问题,是大可讨论的。在讨论当下文化及文学问题时,对弥漫四方的“现代病”我多有批判。这一姿态也许有些可笑,因为它仍然含有历史主体意识的自我控制,而它的“真理意志”在八十年代已经证实了它的虚幻。但一种精神传统的承传与延续往往是很难摆脱的,这些不经意的流露与坚持,既是一种书生意气,也是一种内心需要。我很佩服一些做学术史的朋友,他们端坐于书房,平静地做“学术中人”,既潜心于扎实的文化建造,又

能获得内心的满足,同时还有被认为是“真正做学问”的赞誉。然而,每当听到他们的交谈或读他们的著述,总会感到那是来自历史遥远的回响,敬佩而难以亲近。

九十年代以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如浪排天,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因难以进入经济活动的主战场而走向边缘,主体的位移使这一群体面临着真正的危机和挑战,传统的优越已经荡然无存,值得夸耀的圣言传播和悲壮情怀在今天变得可笑和滑稽,我们甚至连献身方式都难以找到,这种无处诉说的苦痛使许多人的情绪降到零点。我置身其间,自然有强烈的感受。所幸的是,九十年代初期,我一直住在北大昏暗的学生宿舍,社会上翻卷变化的一切并不能对我构成冲击,平静的未名湖仿佛无言地告知我应有的选择和坚持。那几年,我系统地阅读了百年来经典的文化思想和文学作品,系统地梳理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情感方式。每当夜晚走在湖边宁静的小路,心中翻卷着难平的波澜,苦难的知识界阅尽百年沧桑,他们必定还要宿命般地承受现实的无情。而这一切显然是值得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便抛开了对生存处境日益恶化的焦虑,而专注于个人的学术思考。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当代文学学科问题的考虑,一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地位的反省。多年来,当代文学一直是个议论颇多的学科,搞当代文学的人大多被认为“没有学问”,学科也始终处于语焉不详的暧昧语境之中,人们宁愿相信有关李白的通俗读物是学问,也不愿相信严整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是学问;宁愿相信研究“新儒家”或哪怕是陈布雷是学问,也不愿相信研究“样板戏”或贾平凹是学问。这种偏见一方面自是因其无知,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必须转化和改造,而它的有效途径就是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中汲取合理的成分。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对史料的重视,对多种文化因素的重视,使得这一研究可靠而可信,它在注重政治因素的同时,也注意对多样的文化意识形态及个人原因的研究。这与当代文学那种要么是新方法、新概念,要么是感觉式的批评是非常不同的。

而知识分子的精神地位,既是一个历史的学术对象,又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命题。这一问题的提出,首先是洪子诚先生。他于1989年就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他对我有关键性的启发。联系到当代文学的具体内容,他发现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始终存在一个精神地位问题。沿着这一思路,我认真梳理了以名教为表征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以及它在当代文化、文学中仍未消失的巨大影响,它的合理性内容,以及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制约。这些工作仍在进行,它究竟会取得怎样的成果,我个人并没有太高的期许,但我相信它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这代人,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哺育和影响,苦难而辽远的俄罗斯在我的想象中变得顽强而富有诗意。我喜欢赫尔岑、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契诃夫、帕斯捷尔纳克、瓦西里耶夫,以及俄罗斯的音乐和歌曲。在那种文化中,我仿佛看到了永不屈服的坚韧和勇敢,永远有理想照耀的信念。也正因为如此,我喜欢现代中国的鲁迅、瞿秋白、路翎、早期艾青,以及穆旦、昌耀和王洛宾,在苦难的中国,他们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人格成就,他们贡献了韧性、智慧、想象和多情,在今日中国,想起了他们,心中就有许多美丽涌起。我也喜欢俄罗斯和好莱坞的电影,喜欢奥斯卡的颁奖仪式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我觉得这些仪式文明,简练而充满了欢快。但我不喜欢中国的明星,因为他们一边满含热泪歌唱祖国和人民,一边在台下数巨额演出费,这是今天最为经典的虚伪场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尽管我无法改变它。

面对许许多多的“现代病”,我于1995年提出了“新理想”这一概念,并在此后的批评实践中坚持了它。后来它变成我的文化信念,因为在历史与现实中我都能看到它的合理性。通过具体的表达,我想这一概念并不空泛,它已为一些青年朋友所接受。

也是这一年,我读过一本名叫《焦点》的杂志,它的封面上印着一个女孩的照片,她的背后是深圳老街充满了诱惑力的商业区和多彩的广告,身边是行色匆匆的拥挤人流,她背着一个简单的背包,神情忧郁,眼光单纯而坚定,她只身来到了这陌生的明星城市,去挑战

未知的明天和命运。照片上女孩的神情让我经久不忘，它喻示着一种新的观念已经形成，她将用并不浪漫的努力去实现心中浪漫的梦想。我愿意用“新理想”维护和倡导的一切送她上路，并深深地祝福她们。

激进的理想和世纪之梦，使知识分子常常慷慨激昂又常常词不达意，然而他们的情怀却又常常令人感到鼓舞，我成了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就愿意延续传接他们手中的文化圣火，让它不熄地燃烧于民族的精神高地。旧的理想已经幻灭，新的理想正在升起……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

目 录

前记:心灵的报告	1
崇高,在他的作品中高高飞翔	
——孟伟哉军事题材小说创作漫评	1
富于个性和创造的评论	
——读吴亮的评论《自然·历史·人》	12
评雷抒雁的诗歌创作	25
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	37
青年文学中的郑万隆	
——郑万隆近年小说创作浅说	46
一部明快别致、隽永秀丽的抒情乐章	
——评长篇小说《从滇池飞出的旋律》	59
在沉吟中升起进取的风帆	
——评张抗抗近期小说创作	65
激进的理想与世纪之梦	
——新时期文学的百年文化背景	79
百年中国:作家的情感方式与精神地位	93
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09
进化论与西学东渐	
——百年文学思潮研究之一	124

东方风情与生活寓言

——八十年代的文学想象与文化批判	132
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提出与面临的困惑	149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现实与未来	156
九十年代文学的格局与景观	164
世纪之交的文化矛盾	170
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归依	
——九十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	179

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

——以闻一多先生为例	184
------------------	-----

精神信念与知识分子的宿命

——谢冕文学思想论纲	191
------------------	-----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化

——洪子诚的意义与启示	203
-------------------	-----

悲壮而苍凉的选择

——陈骏涛的文学批评与批评家的宿命	211
-------------------------	-----

英姿勃发的文化挑战

——陈晓明和他的文学批评	218
--------------------	-----

历史叙事中的当代情怀

——评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	227
--------------------------	-----

人的关怀需要

——读弗罗姆《健全的社会》	231
---------------------	-----

精神传统与文化焦虑	233
-----------------	-----

庸常年代的思想风暴

——韩少功九十年代论要	240
-------------------	-----

《白鹿原》

——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	249
-------------------	-----

小说之外:那个单身鏖战的人	
——重读《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253
爱的神话和它的时代	
——重评《爱,是不能忘记的》	257
觉醒与承诺	
——重读《乡场上》	262
体验自由	
——重读《走向混沌》《我的菩提树》	266
回望“新写实”	270
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	
——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	277
民间传统与中国的现代性	284
女性的故事	
——林白的女性小说写作	287
弱势性别:与现实的艰难对话	
——评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	294
忧郁的荒原:女性漂泊的心路秘史	
——陈染小说的一种解读	299
逃离意识与女性宿命	
——徐小斌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308
“后现代”策略与现代主义之恋	
——评马建的长篇小说《九条叉路》	316
物欲都市的迷乱与反抗	
——评邱华栋的都市小说创作	320
文化马戏中的“好诗主义”	327
在生命的深渊歌唱	
——读灰娃诗集《山鬼故家》	331
“独旅”诗人的承诺与限度	
——评张洪波的诗歌创作	334